

2017年5月8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BCA) 公聽會

解決 BCA/TSA 操練的源頭---踢走大數據誘惑、剔除學校報告

何淑儀 2017年5月8日

TSA 由 2004 年開始到 2016 年檢討小三 TSA 到今年全面復考，都是圍繞操練和壓力的問題。其實去年至今，民間的討論已逐漸有共識，例如不記校名，不記學生名的評估；抽樣考，隔幾年考一次；停止不必要的測考，減少學生的焦慮和自殘行為等。不過，這些建議，教育局和一些學者卻統統說不可以。究竟背後有什麼原因呢？

程介明教授和很多學者提到「大數據誘惑」。何瑞珠教授更批評教育局將大數據研究伸延到 TSA 及 PISA(學生能力國際計劃)這些本屬低風險的評估使其變成高風險，影響學生的學習和精神健康(註 1)。

大數據研究誘使教育局和一些學者追求越多數據越好為目的，於是 TSA 和 PISA 要求有個別學校和個別學生的身份認碼 (註 2,3)，配合原本高風險的小五小六三次升中呈分試，Pre-S1 Assessment，DSE，教育局就可以掌握所有學生的個人成績作各項的追蹤和比較。

何瑞珠教授和很多教育有心人多番強調，為了收集大數據而必須記校名，記學生名就會產生很多誘因影響評估的結果，包括學校為求答對率高而不斷操練學生，追捧成績而考試主導了學習、用 BCA 避過辦學團體和教育局的問責等。這些因素必會影響評估本身的信度和效度。加上有校長奉 BCA 的學校報告當做寶，做問責工具，做成效指標，操練誘因根本不會減少。

教育局和一些學者、校長不把孩子的愉快學習和全人發展放在教育首位，只追求大數據研究的滿足感、跨大 BCA 和學校報告的功能。事到如今《自己孩子自己救》。家長可以考慮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去信教育局及使用這些個人資料的機構表達立場：要求他們在收集和使用大數據研究時，必須清楚向研究對象說明目的，在未得研究對象同意之前，不得使用其個人資料進行任何追蹤和比較。

TSA 只是全港性系統評估，不應有個別的學校報告，更不能有個別學生的身份認碼(註 4)，這樣才能剔除學校操練學生的誘因。TSA 既是系統性評估，就無需全民皆考；抽樣考，隔幾年考是不影響統計結果。如果個別學校想知道自己教與學的水平 and 學生表現，大可利用 BCA 的 STAR 平台，或者教育局督學定期視學，及尋求教育局的專業支援等，方法很多，請不要扭曲和複雜化了 TSA 的原意。

註：

1.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PISA 2015：評考試壓力成常態，愉快學習成奢望！」教育眼 2017年4月22日
2. 程介明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 「大數據：誘惑與操守」信報財經新聞 2017年4月28日
3.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TSA 的誤用及 PISA 的危機」明報 2015年8月13日
4. 過去教育局多次強調沒有學生的個人資料，但學校報告本身就是一種身份認碼，而 BCA 考卷上要求學生貼上身份認碼的標籤，也屬於學生的個人資料。BCA 學校報告對整體學生的成績分析也是由幾百個學生的個人資料歸納而成。